

●侯有德 张宇宏 赵怀生

我国中文同类书排列书次号研究述评

书次号是排检同类图书的整序号码。建国40年来,同类图书排列书次号的研究从几起几落到百花齐放,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路程。在图书分类法趋向统一的今天,书次号的标准化和统一问题,已引起图书馆界的普遍关注。

一、研究现状

(一) 论文成果。据调查,建国以来关于书次号的研究论文共有190余篇。其中,综合概述文章57篇;分类-种次号20篇;分类-著者号95篇;分类-出版时间号14篇;分类-书名号2篇;分类-登录号2篇;分类-页码号1篇。另外,还有辅助区分号文章2篇。

(二) 方案种类。据不完全统计,关于书次号的编制方法共有以下7类25种:

1. 分类-登录号;
2. 分类-出版者号;
3. 分类-书名号;
4. 分类-页码号;
5. 分类-出版年月号(包括分类-出版年月-种次号);
6. 分类-种次号(包括分类-种次-著者号);
7. 分类-著者号。其中,又分两类:

(1) 汉字笔型、形位著者号码。包括: A. 拼写法: 计有四角号码; 一角号; 标准电码。 B. 查号法: 有笔划笔形法(王凤翥等)。 C. 拼查号法: 有笔划四角号等。

(2) 汉语拼音著者号码。包括: A. 拼写法: 声母和代号(蒋完奎、陈仇白等数种); 三字头法(夏镇); 声韵结合代号(赵颂尧、吴勋泽等)。 B. 查号法: 全拼音著者号(李修宇、茅振芳); 拼音、汉字结合著者号(侯有德); 全汉字著者号,其中包括混合二位数字著者号(袁涌进等); 混合三位数字著者号(武汉大学、大连工学院、上海社科院、福建省图书馆、西北农大等10多种); 混合2~3位数字著者号(河南查号法)。 C. 拼查结合著

者号(侯有德等)

(三) 采用情况。1. 分类登录号。已在一些小型图书馆使用。2. 分类出版年月号。已在极少数图书馆使用。3. 分类种次号。已在全国80%的大中小图书馆使用。4. 分类著者号。使用此种方法的多为老馆、大馆,约占全国图书馆的10%。其它3种方案未见使用。

二、对研究现状和实践的分析

我国关于书次号的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1965年前,发表26篇论文,占13%; 1966~1976年,仅发表3篇论文,占2%; 1977~1979年发表13篇论文,占7%; 1980~1989年发表151篇论文,占78%。论文分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进程,即:“文化大革命”前,书次号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没有研究;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逐步向盛期发展,出现了各家各表和各种方法的比较与争鸣。

在国外,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早就肯定了著者号,而且已经趋向统一。在我国,西文图书引进并采用了卡特著者号码表,俄文图书引进并采用了哈夫金娜著者号码表,日文图书引进并采用了植村著者号码表。尽管如此,但对国外书次号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前只有1篇研究论文。1960年,北京图书馆召开了一次著者号座谈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把研究坚持下去。1953年,《人大法》问世,提出了种次号方案。但一直到1974年,却一直没有出现研究种次号的论文。种次号与著者号相比,前者简明易懂,便于取号,方便利用,而后者则重号较多,号码较长,而且各家不一,因而,不少中小型图书馆采用了种次号。后来,少数大型图书馆改用种次号又带动和加速了种次号在图书馆界的普遍使用。

纵观40年书次号研究的进程,在1974年前,

基本上是关于著者号的研究,1975~1989年,种次号超过了著者号的研究,达到一个全盛时期。在此期间的1980~1987年,曾出现过一段出版年月号的研究热潮。总的来看,在1984年以前,其它方面的文章少于种次号,而在1984年以后,其它方面的文章则多于种次号。从上可以看出,著者号、种次号和出版时间号之间的争论是在1975~1986年和1980~1987年之间交叉进行的。在争论中,重心左右摇摆,缺乏统一的主攻方向,故争论难于定论。当分类法标准化提到图书馆界的议事日程,种次号的致命弱点为大多数人认识,进而通过冷静、认真的比较后,图书馆界才把书次号的研究统一到著者号的方向上来。从著者号研究开始,到种次号的问世,加上出版时间号的提出,最后又回到把著者号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在这里,经历了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1960年,北京图书馆召开的全国范围内的著者号座谈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81年,天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两期同类图书排列问题笔谈会,1982年,河南召开的书次号专题研讨会,以及分类法趋向统一的形势,使书次号标准化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研究的日程之上。1988年10月,在杭州召开了全国中文同类书排列号研讨会。同年,浙江和河南相继成立了著者号课题研究组。由于加强了领导,建立了组织,通过协同作战、联合攻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去年8月,全国文标会第五分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和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在杭州联合召开了全国中文同类书排列书次号标准化研讨会,使书次号研究有领导有组织地纳入了国家标准化研究的日程,并为统一组织、鉴别选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对发展方向和前景的分析

今后,中心问题是加强领导,集体攻关,使比较理想的统一的书次号早日问世。

(一) 应尽快制定书次号的评鉴标准。书次号是排检同类图书的次第号。各自为政的手工作业的情况下,各馆用什么方法排检图书和卡片,似乎都无所谓,因为,从表面上看,一馆并不影响他馆,并不影响大局。但要实现集中编目和联合编目,要变馆藏为国藏,就必须统一书次号,走分编工作标准化的道路。为了统一书次号,就必须尽快制定出书次号的评鉴标准。只有这样,才便于比较,便于

鉴别和选优。对于评鉴标准,我们认为应包含科学性和实用性两个方面。科学性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为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二是规律性强,有内在联系;三是适应手检和机检需要,便于全国统一。实用性好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明易懂,方便使用;二是号码较短,重号较少;三是具伸缩性,辅助区分符号较好。

(二) 著者号应该成为书次号的发展方向。国外经验和国内40年书次号研究都说明,著者号有着广泛的实用基础和发展前景。我们可从种次号、出版年月号、书名号和著者号的具体分析来说明。

1. 种次号。尽管优点很多,但致命弱点是人为序列,它只在一个类目内起作用,换法改类,就失去原序号的作用,而且规律性不强,不具备检索功能,同时全国也无法统一。

2. 书名号。是分类的延续,全国可统一,但在同类图书中重号较多,要想减少重号则会导致号码冗长,所以采用者极少。

3. 出版年月号。同样,是分类的延续,全国可统一,但以出版时间查找入口的机会少于著者号,而且重号较多。

4. 著者号。是分类的延续,规律性强,有内在联系,通常是重要的查找入口,而且便于全国统一。和种次号、书名号、出版时间号、登录号、页码号等比较起来,著者号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稳定性,所以有着坚实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书次号的发展方向。

(三) 在著者号中,音序法优于形序法,应该成为著者号的发展方向。诚然,以著者姓名取书次号的方法颇多,但大体可归纳为形序法和音序法两大类:

1. 形序法。在形序中,又有偏旁部首、笔划笔顺和四角号码等之分。随着汉字的简化,给形序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仅偏旁部首、笔划笔顺多有变化,而且四角号码也出现了新旧取号上的改变(这种变更有400多个)。由于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差异,加之个人习惯,即便一字几画有时也很难统一。同时简化汉字和繁体汉字可能在著者中同时出现,势必造成一字两地,增加排检困难。所以,形序法不是作为著者取号的理想方法。

2. 音序法。在以著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取号依据中,不论纯字母制、纯数字制或者字母、数字混合制,都各有其取号的规律,而且以汉语拼音取著者号也符合我国文字改革的大方向。

从上述比较来看,音序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它优于形序法, 应该成为著者号的发展方向。

(四) 在音序法的著者号中, 查号法又优于拼音法, 应该成为音序法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的发展方向。拼音法和查号法虽互有长短, 各具特色, 图书馆界多数倾向于查号法, 而且认为它优于拼音法。

(五) 混合 2~3 位数著者号, 既优于全拼音著者号, 又优于混合二位数、三位数著者号, 应该成为查号法汉语拼音著者号的发展方向。在查号法的汉语拼音著者号中, 又有全拼音、全汉字和汉字拼音结合三种编制方法。下面以全拼音和全汉字两种方法作一比较:

1. 全拼音著者号。全拼音著者号按著者首字音节的频率配号。这种表一般采用的混合二位数数字, 容量小, 重号多, 同音节内同声调、同一汉字的归不到一起, 另外不直观, 序列不够严谨也是一个问题。常见字和音节相结合的著者号也有类似的弱点。

2. 全汉字著者。其中, 又分混合二位数著者号、混合三位数著者号和混合 2~3 位数著者号三种。

(1) 混合二位数数字著者号。一个字母二位数数字的著者号, 容量小, 重号多, 无伸缩性, 序列不严谨是最大的弱点。例如, 在北京图书馆 47 万种中文图书著者目录中, “中”字出现 24930 次, 占本字头“Z”的 38%, 而“珍”字则仅出现 2 次, 占本字头“Z”的 0.0025%, 两者出现频率差万倍以上。袁涌进表的“中”字分配 4 个号码, “珍”字分配 0.13 字号 (6 个字 1 号), 配号频率差为 37 倍。因此, 配号多少和出现频率不成比例, 势必形成重号多这一难题。

(2) 混合三位数数字著者号。即一个字母, 三位数字的著者号。同样, 它的重号也较多, 号码也较长, 并无伸缩性。仍以“中”、“珍”二字为例: 在武大著者号码表中, “中”字配 110 个号, “珍”字配 1 个号, 配号频率差为 110 倍, 出现频率和配号多少不成比例, 必然会造成重号多。假若, “中”字配 320 个号码, 罕见的“珍”字能同其它罕见字 3~4 个配一个号, 重号可能会少。但在大馆定有不常用类目、小馆在同类图书都不多的情况下, 一开始都取用一个字母三位数字的较长号码, 是没有必要的。

(3) 混合 2~3 位数著者号。即一个字母连同二到三位数字的著者号。通过对混合二位、混合三位数数字著者号的分析, 我们认为, 吸取两者的优点, 克服二者的弱点, 采用一个字母连同二到三位

数字的著者号较为理想。因为, 首先它是混合二位数的, 比较简明, 号码较短, 常见字可达四声定位, 序列较严谨, 若遇重号可立即扩展为三位数以上, 具伸缩性, 因采用的是小数制, 大序列不变, 扩展一位数, 容量则加大 10 倍, 重号极少。其次, 它又是混合三位数的, 为了达到罕见字的四声定位, 必须用混合三位数以上的容量才行。由于是罕见字, 出现频率低, 故用混合三位数来表示是较为理想的。河南查号法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正是根据这种指导思想设计编制的。它在注重按频率配号的同时, 兼顾了收列汉字的范围、总量及声调位置, 所以, 它序列较严谨, 号码较短, 重号也少, 和同类诸表相比, 科学性和实用性结合较好, 是比较理想的。

(六) 有待研讨的几个问题。在编制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 (查号法) 的过程中, 以下 4 个问题比较突出, 需进一步商榷。

1. 选收汉字的范围问题。一个著者号码表, 究竟选收多少汉字为宜? 据调查, 北京图书馆 47 万张中文著者目录出现汉字 2300 多个, 北京大学图书馆 28 万张中文著者目录出现汉字 2000 多个, 国家版本图书馆 47 万张中文个人著者目录出现汉字 1700 多个。其中, 北大图书馆比北图多出新字 300 多, 版本图书馆比北图、北大图书馆又多出新字 200 多。三馆相加, 共出现不同著者首字 2800 多个。鉴于罕见著者 (尤其是团体著者) 用字极分散, 不稳定, 所收列的 2800 多字, 甚至更多的字也不一定能保证著者首字的收选完整。为了解决主要矛盾, 河南查号法从三馆相加的 2800 余字中筛去少数的冷僻字, 最终选收了 2700 多个汉字, 是否适宜, 有待商讨。

2. 书次号个别化定位问题。同类书排列号只有个别化, 才利于图书和目录的排检。在诸种书次号中, 除种次号能做到一书一号外, 其它的均有重号发生, 要克服重号, 就需要有区分符号。有的馆存在重号, 有的馆可能不存在重号, 为了统一起见, 是否在四位号码 (或一个字母三位数字) 以外, 由各馆自定, 从第五位数始用种次号或其他区分方法 (辅助区分符号除外)。

3. 辅助区分符号问题。因为各类书次号都需用辅助区分符号, 所以应该统一。如版次、卷册可与中文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统一起来, 分别用“=X”、“: X”表示。同一著者的不同作品, 一般用种次号区分。同著者同一作品的不同译者, 一般用译者首

(下转 68 页)

(五)“中国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图书馆学”是世界图书馆学的一部分,对世界图书馆学将有特别贡献。同时,“中国图书馆学”又是世界学术和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40〕}。

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和他的具体工作成果,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几十年来,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方面,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应用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先生的设想。但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用“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智识”“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使我国图书馆事业走在世界前列,使世界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则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的。中国应该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为此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1
-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北京:中华书局,1988.24.
- 〔3〕〔24〕 桑健.图书馆学概论.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变法通议》.北京:中华书局,1988.33.
- 〔5〕〔7〕〔16〕 张锦郎,黄渊泉.中国近六十年来

图书馆事业大事记.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

-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8.127
-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记尚贤堂》.北京:中华书局,1988.31~32.
- 〔9〕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221~222
-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戴东原图书馆缘起》.北京:中华书局,1988.110~111.
-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松坡图书馆记》附《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北京:中华书局,1988.29.
- 〔12〕 宋益民,吴景熙.《松坡图书馆始末》.北图通讯,1982.(2)
- 〔13〕 毛轩华,权儒学.北京图书馆馆史(1948年以前)档案选录(下).文献,1987.(4):223
- 〔14〕〔15〕 毛轩华,权儒学.北京图书馆馆史(1948年以前)档案选录(下).文献,1988.(1):241
-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除“残稿”见于1941年旧版外,其余俱见北京中华书局,1988版
- 〔18〕~〔20〕、〔22〕、〔23〕、〔25〕、〔27〕、〔29〕、〔33〕、〔34〕、〔36〕~〔4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北京:中华书局,1988.42~49.
- 〔21〕、〔28〕、〔30〕~〔32〕、〔3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词》.北京:中华书局,1988.8~9.
- 〔26〕 同〔9〕.226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中学。
来稿时间:1991.7。编发者:徐 苇。)

(上接45页)

字母区分。假若仍重号,不另统一规定是否合适,尤待讨论。

4.罕见字的配号问题。

由于罕见字量大,又异常分散,若不按频率一字一号,容易做到,假若按接近频率配号,则混合三位数容量不够,起码需4~5位数以上。这样,号码长,不便工作。但是,收列汉字达到四声定位后按笔画顺排,重号就可能更少,在混合三位数字以内收列汉字达到四声定位,只能几字一号,这

将可能出现这几个字的临近交叉。因是同一个号码,权衡利弊是否以后者为宜。

以上是我们对建国以来书次号研究的现状和前景的一些述评浅见。现在,全国文标会第五分委会已经把全国的著者号课题组和研究同仁们组织起来,我们相信,我国书次号的研究和实践一定能趁此大好时机,取得更大的进展。

(作者单位:侯有德,河南技术师院。张宇宏,洛阳工学院。赵怀生,安阳市图书馆。来稿时间:1991.9。编发者:丘峰。)

collocation methods and 4 kinds of the arrangement of classification numbers.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 Applications

Collocation of Classification numbers — Rules and regulations

Document indexing — The Library of Railways

G254.122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Application of Ozone to Library Sterilization / Li Jingre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32~34

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ozone to the sterilization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agenci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troducing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ozone, the density and effect of ozone sterilization, the effect that ozone has the writings on the book paper and the ozone sterilization equipments, etc.

Preservation of books — Studies

Ozone — Applications

G253.6

Librarians and the Library Spirit / Cheng Huanwe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35~42

By analysing the zeal for studying characters of the library world during 1980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concept of "humanistic library science" i.e. taking the "librarians" as the centre of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ians and library undertak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and the society, and to elaborate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ibraria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brary spirit, the content of which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phases: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love for one's library, fraternity among one's colleagues and taking good care of books. 11 references.

Librarians — mental style and features

Librarians — Professional morality

Library scientists — China

G251.6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Book Number System for the Arrangement of Chinese Books in China / Hou Youde, Zhang Yuhong and Zhao Huaishe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43~45,68

In the last 40 years, more than 190 pieces of book-number research papers have been produced in China, and 25 types from 7 classes of schemes for working out book numbers were put forward. Since the August of 1990, the study of book number system has already brought into the limits of functions of the China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of Standardiz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NTCSID). The pressing matter of the moment is: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tackling this key problem with a collective effort, formulating as early as possible standards for appraising book numbers and finally, taking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 of book number searching mixed with two or three-figure numbers of the author number as the way forward for book number system in China.

Call numbers — Studies and reviews

Book numbers — History

Author numbers — Studies

G254.13